

汉译佛经的语料价值及其对汉语的贡献

张 烨

(大连民族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5)

摘 要:阐释了佛经这种特殊语料的价值,它的出现促进了古白话书面语的产生,为本土文学提供了营养,促进了汉地其他文体的衍生和发展,其确切的成书年代有助于断代研究。译经语言是语言接触的重要体现,因而也对汉语自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指出佛经文献对汉语的贡献主要包括对词汇、词义系统的充实,对词类中成员的扩充、影响以及对语法结构的丰富和扩展。

关键词:汉译佛经;语料;价值;影响;汉语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志码:A

Valu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Language

ZHANG Ye

(College of Chinese and Law, Dalian Minzu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05, China)

Abstract: The corpu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s of great value in that it has promoted the production of ancient vernacular written language, provided nutritions for native literature, and enh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styles in China. The affirmed tim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is helpful for the study of division of history into periods. Language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language contact. Therefore, i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language itself.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enrichment of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the expansion of members in word classes, and the extension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s.

Key word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corpus; value; impact; Chinese

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土,大量的梵文原典被翻译成了汉语。佛经语料具有口语性强、语言容量大、年代跨度广、文体独特等特性,具有不可忽视的语料价值。此外,佛教属于外来文化,佛经语言被朱庆之称为“佛教混合汉语”(Buddhist Hybrid Chinese)^[1],它不仅是语言接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为汉语注入了活力。

近年来,译经研究的论著逐渐增多,据《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以及对近十年来文献的统计,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的论文约有1300多篇,有的是从传统训诂学角度入手,有的是从专书角度考察,还有将佛经与中土文献进

行对比。从语言理论方面研究的也有很多,已有成果在下文还会涉及。总的来说,译经研究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对于佛经文献的语料价值及其对汉语的贡献还缺乏系统性的认识,本文拟从这两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一、汉译佛经文献的语料价值

1. 汉译佛经的出现是古白话书面语产生的重要诱因

古汉语有两个书面系统,分别为“文言”和“古白话”^[2]。对于“古白话”的起源和界定,学

收稿日期:2018-03-06;最后修回日期:2018-03-2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烨(1984-),女,辽宁大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史、对外汉语研究。

者们曾有分歧。例如,王力^[2]、吕叔湘^[3]认为它始于唐五代,郭锡良^[4]、李峻鐸^[5]则认为“萌芽于六朝”,还有学者提出早在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例如张中行^[6]、江蓝生^[7]、许威汉^[8]等。徐时仪第一次系统探讨了汉语白话的发展历程,认为:“白话是一个与文言相对而并存的反映了东汉至今历代口语成分的汉语书面语系统。”^[9]语言很难发生突变,所以古白话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口语的基础上逐步影响文言文的,因此我们推断:“古白话口语应是在古白话书面语出现之前即已存在了,只不过基本上没有在同期书面语中反映出来罢了。”^[10]古白话书面语在东汉时期出现,汉译佛经的产生是重要诱因。首先,从译介方式来看,早期佛经翻译多是由西域、中亚僧人口述,再由汉人笔译而成。文言本身极难掌握,外来僧人要想熟练运用需要多年时间,相较而下显然口语更易掌握,而且即使其文言达到一定水准,也多少会受到当时口语的影响。其次,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所涉及的义理对汉人来说都是抽象的,其教义与儒家、道家也有差异,因而多半采用“格义”^①的方式进行比附,从而阐释佛教义理。再次,从传播的角度来说,佛教中有一个核心概念“方便”(Upāya),它不仅是阐释经义的方式,也被运用于宣扬佛理。例如佛家的“俗讲”便是通过“悦俗邀布施”而进行的宗教说唱活动,它面向普通大众,所以译师多选用贴近平民的俗语。以上原因都会造成译经中口语成分较高,所以有学者归纳:“白话的产生是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和汉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11]

2. 大容量的佛经语言为本土文学提供丰富营养

朱庆之认为《大正藏》共收录汉文佛典2206部,8899卷,总计7565万字^[12],语言容量十分可观。佛经文献卷帙浩繁,其涵盖的内容也包罗万象。作为宗教文化的智慧结晶,它不仅是佛教信仰者的经典,也可以为本土文学提供丰富的营养。具体来说,佛经分为“经”“律”“论”三藏,其中“经

藏”是梵语“Sūtrapitaka”的意译,佛陀所说要义大多源于此,包含佛陀对世间万物的洞察以及对人生的思考等。“论藏”是对佛陀教说的进一步发展,多是对经义加以议论、阐释。“律藏”包含了佛陀为弟子制定的教团规则及规定等。从“三藏”的内容可以看出,佛经并非高高在上,它与大众生活紧密相连,例如社会意识、道德信仰以及文学故事等文化现象。以文学为例,佛教为本土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 - 1918)曾著《佛经中五百故事》,其中大部分都被本土文学所吸收。如“阳羨书生”^②的故事便与《旧杂譬喻经》中的“壶中人”如出一辙,在后代小说、戏剧中也有类似情节,如汤显祖《邯郸记》中便有卢生欲跳入壶中一探究竟的细节。再如“瞎子摸象”“九色鹿”“傀儡戏”也都广为流传,有的已成为本土文学作品中的经典篇章。从佛经内容的表达来看,依然体现了“方便”的特性,其表达不拘于说教,各种寓言、譬喻故事、劝善书、见闻录等屡见不鲜,这也为纷繁的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载体,更有助于本土文学的发展。

3. 独有译经文体,促进汉地其他文体的衍生和发展

佛经文体形成复杂,有的译文虽已转为汉语,但仍然是外来文化与本土语言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风格,后代学者将其归纳为“译经体”^③。其主要特点是散文和偈颂交替使用,而散文连写、偈颂分句提行的文体格式是汉语没有的,后代的变文、宝卷都直接吸取了这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译经体”在与本土文体互动的过程中吸取了新的养分,进一步创发,对汉地其他文体也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佛经按其叙述形式主要分为“十二部”,三国支谦《七知经》:“一曰文,二曰歌,三曰说,四曰颂,五曰譬喻,六曰本起经,七曰事解,八曰生传,九曰广博,十曰自然,十一曰行,十二曰章句,是为知法。”^④

① “格义”是早期佛经翻译所采用的典型手段,陈寅恪在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书信集》第161页对此作了解释:“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与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

② “阳羨书生”出自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故事当来源于《旧杂譬喻经》,二者主体构思一致,细节不尽相同。佛经中是用“壶中吐人”的方式,而“阳羨书生”则是人在鹅笼中。

③ 这种文体早在1996年出版的胡适《白话文学史》中便曾提及,文中认为:“印度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重说一遍。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之后,在中国文学上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第115页)。后代学者把这种文体直接归纳为“译经体”,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第38页中便已出现该术语。

④ 这是梵语意译的说法,鸠摩罗什《成实论》中全采用音译,分别为:一修多罗,二祇夜,三和伽罗那,四伽陀,五憂陀那,六尼陀那,七阿波陀那,八伊帝曰多伽,九闍陀伽,十鞞佛略,十一阿浮多達磨,十二曼波提舍。

从表面上看,这“十二部”与本土文体有近似之处,如“文”“歌”“颂”。李小荣认为,“散文”(即上述的“文”)最早应用于唐代的佛经翻译中,指的是相对于偈颂(包括“歌、颂”)而言的一种佛经文体^[13]。正是由于与中土的散文有共通之处,才促进了“散文”由佛经文体转成汉语通用文体。而“偈颂”在佛经中的广泛应用,也对“韵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凉的昙无讖最早用五言诗体翻译长诗《佛所行赞》,其口语化的语言,不过分追求骈偶的风格在诗歌中形成了一种风气,后代“永明体”的产生便是建立在此期译经的基础上,这种“译经体”也间接促进了唐诗宋词的盛行。

4. 较为确切的成书年代利于断代研究

吕澂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中列举了历代佛经的著录书,共计16部,分别记载了译经的品目以及译者生平等,可与《大藏经》中的题署互相参证,能够确认的译经,其成书阶段是较为可靠的。程湘清在讨论理想语料时认为:“要看口述或撰写某部专书的作者是否属于该断代。”^[14]早期译师以外国人为主,据他们生平事迹的记载来看,绝大多数都是一到中国便投入到译经中去,可以说,除却失译的经书以及有争议的疑伪经,译者使用的语言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基本吻合,可以体现共时的特点。从断代研究的角度来看,译经语料具有较为确切的成书年代,因而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语料。

二、佛经文献对汉语的影响

汉译佛经作为语言接触的产物,势必掺杂了外来语言的某些特色,汉民族在广泛吸纳佛经的同时,汉语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佛教混合汉语”的影响。下面具体阐释。

1. 丰富了词汇以及词义系统

梁晓虹曾说:“佛教对汉语的影响,最明显、最突出的还是表现在词汇上。”^[15]词汇作为语言三要素中最不稳定的,佛教传入必定会给原有的系统打上深刻的烙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汉语注入了新的造词方式。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译师需将梵语翻译成大众熟知的语言,这势必要构造大量新词,这种大规模的造词活动是以往少有的,当遇到汉语难以表达的概念时,新的造词手段就应运而生。其中最能体现外来色彩的当属“音译造词”,常见的音译词如“塔、佛、菩提”等。由于音译词在音节、理据以及

用字上往往与汉语殊异,所以“合璧造词”的方式随之产生,即在原有音译的基础上添加意译成分,如“禅定、刹土”等。此外,还有“意译造词”,例如“精进、境界、世界”等,从表面上看,它是利用汉语固有语素和构词法创制而来,事实上,意译词的语义源于外语,所以这也是新兴造词方式之一。此外,译经也有可能促进汉语原有造词法的发展。例如“缩略造词”,颜洽茂曾做过探讨,如“四阿含、四神足、五根、三十二相”等都属于此类^[16],这种类型产生的新词数量较为丰富。再如佛经中善用譬喻,所以对汉语的修辞造词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为了解释“法”这个抽象概念,运用了各种生动的喻体,如“法海、法宝、法网、法轮”等,很多还成了现代汉语常用词。

(2)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译经记录了很多不见于中土文献的口语词。例如周一良曾列举了“曼、缘、续、将无”等词^[17],它们在魏晋南北朝的其他文献中罕见。徐时仪(2005)对玄应《众经音义》中的方俗口语进行考察,重点探讨了“搥、躡、掐、坎、染著、唐、糖煨、洩汰、疼、嚏、洋、站、頔”^[18],这些口语词很多都源于佛经,丰富了当时的词汇系统。再如译经语言中兼有构词和构形作用的语素“家、师、头、等、曹”也大量出现,它们有的已成为汉语中的类词缀,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从数据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词典》中源于佛经的词汇足有上百例之多,例如表“时空”的“世界、刹那、过去、现在”等;再如表“佛教活动”的“火化、还愿、超度、阎王”等;还有与哲学相关的词,如“因缘、因果、无为、平等”等。除此以外,大量体现梵汉文化合璧的固定用语也随之出现,据梁晓虹统计,汉语丰富多彩的成语中有三百余条来自于佛教文化^[19],朱瑞玖在《佛教成语》中则收录了471个与佛教相关的成语,如今天所熟知的“皆大欢喜、作茧自缚、五体投地”等。佛经中还衍生了若干俗语、歇后语,较为典型的有“无事不登三宝殿”“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等,它们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也为汉语增添了活力。

(3)充实了汉语的语义系统。佛教是外来之学,如果为每个概念都创制新词,显然不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正如颜洽茂所说:“译经师除创造‘寂灭’‘烦恼’‘解脱’等新词或通过音译转写等方式接受外语词表示教义之外,大部分是通过‘灌注’而使中土语词‘佛化’。”^[20]综合学者们的研究,

“灌注”新义的方式主要有:第一,在原有词义的基础上再引申。如增加了抽象义的“境界、我所”,再如产生了修辞义的“莲华、甘露”等。第二,汉语固有词语素义的重新组合。汉语中的某个语素产生了新义,由其构成的一系列词也产生了新义。据王云路研究,佛经中有由“形”构成的一系列词,如“形调”“形笑”“形毁”,其中“形”在汉语中有“五形”之义,它既可泛指身体,也可专指身体的隐私部分,如阴部,因此“形”便新增了“侮辱”义^[21]。第三,利用汉语词性的再转化,如“给侍”由动词转为名词,“涕泣”也新增了名词义项,表“眼泪”等。

2. 对语法的影响

佛经语料对汉语语法的影响不如词汇那样明显,但是在翻译过程中仍产生了不少新兴语法成分以及新句式,具体有以下两方面。

(1)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影响。梵语文法虽与汉语不同,但它对于词类的划分,包括“八转声”(梵文语法中名词变化的格例)的引入,动词区分及物不及物等特点,都对汉语的词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原有词类的基础上增添了具有佛经特色的成员。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学者们有过较多论述,这里仅举几例,如汉语“已称”代词成员的扩大就可能受到佛经的影响,早期的“已称”代词主要包括“已、自”,俞理明认为译经中的复合式代词也属于这个范畴,如“自他、自身、自我”等^[22],后二者已演变为现代汉语常用词。再如表假设的连词“若也”,据解植永研究,它最初也是源于佛教社团,最终扩散到了世俗人群中^[23]。徐朝红以佛经“本缘部”作为研究对象,共发现11例新兴连词,如“必其、若便”等在后代的中土文献中也较为常用。另一方面,佛经文献中词类成员的产生及功能上^[24]的扩展也会促使汉语词类发生演变。曹广顺对现代汉语进行貌助词“着”做了考察,认为佛经翻译不仅是当时社会的一大需要,还为汉语带来了影响,例如“贪著”“乐著”是把表示心理活动的“著”用于动词之后,隐含了动词获得结果的含义,所以它是动态助词“著”的直接来源^[25]。再如汉魏六朝时期,汉语双音化速度加快,武振玉探讨了如“皆组、都组、咸组”类总括副词的连用情况,认为这一特色也受到了译经的影响^[26]。

(2)丰富、扩展了汉语的语法结构。汉语语法结构的发展和演变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总体而言,佛经文献有承袭的部分,也有创发的因素,某

些佛经中的句式还解释了语法史中的“断层”现象,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本土文献所不具备的价值。例如,早在东汉佛经中就出现一类新异的语法结构,即在动词和受事宾语中添加介词“於”,这在本土文献中极为少见。译经中这类结构的产生可能源于韵文的要求,因为译经有时由固定字数的句子组成“偈颂”,在字数不够的情况下,经常会用虚字起到补足音节的作用,这类用法在佛经中并不少见。今天现代汉语仍会见到“取笑于他”“威胁于他”的语法结构,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佛经文献的影响。再如“被动式”,其古今形式差异明显,而佛经语法的一大特色就是多用被动句,由此也能探查出某些被动式的产生和演化。以具有口语色彩的“被字句”为例,仅从中土文献中难以概括出准确的发展脉络,唐钰明对汉魏六朝佛经中的“被”字句进行了考察,随机统计的结果表明汉译佛经可以解释“被”字句发展过程中令人困惑的断层现象^[27]。中土文献中还有一种传统的被动式,是由引出施事的“为”加上“所V”形成,单独由“所V”构成的被动句数量很少,而朱庆之发现佛经中“所V”式的被动句却大量存在,认为这可能是受到梵文语法的影响^[28]。此外,吴金华考察了佛经中具有特色的“R为A所见V”式^[29],高列过还发现了“为……所V……所V”式等^[30],这些新兴的句式势必会对汉语原有的被动句系统产生促进作用。另如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处置式”,董琨对魏晋南北朝的佛经进行了考察,发现至少在公元三世纪,已经出现了表示处置的“将字句”,并且不在少数^[31]。

三、结 语

佛经语料作为中土文献的补充,无论是其丰富的语言容量,明确的口语性特征还是独特的文体方面,都具有珍贵的语料价值,成为研究者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此外,译经语言作为汉语与其他语言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后的产物,也对汉语自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词汇系统的扩充,语法结构的扩展等。目前对佛经语料的研究还需要完善,很多佛经语料还未被利用,所以只有从整体角度把握佛经语言的特点和全貌,才会进一步探明它的价值以及对汉语的实际影响。

参考文献:

[1] 朱庆之. 佛教混合汉语初论[C]//语言学论丛.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1:1.
- [2] 王力. 古代汉语: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
- [3]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5:1.
- [4] 郭锡良. 古代汉语:第1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1:1.
- [5] 李峻愕. 古白话界说与近代汉语上限的探索[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57-63.
- [6] 张中行. 文言和白话[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90.
- [7] 江蓝生.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古代白话说略[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47.
- [8] 许威汉. 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叙[C]//《汉语白话发展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 [9] 徐时仪. 汉语白话发展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 [10] 徐正考,张彧彧. 关于古白话起源问题的再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2011(10):140-143.
- [11] 江蓝生. 古汉语白话说略[C]//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112-115.
- [12] 朱庆之. 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35.
- [13] 李小荣. 佛经传译与散文文体的得名[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51-55.
- [14] 程湘清. 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9.
- [15] 梁晓虹. 佛教典籍与近代汉语口语[J]. 中国语文, 1992(3):225-231.
- [16] 颜洽茂. 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51.
- [17] 周一良. 论佛典翻译文学[M]//周一良集:第3卷.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7.
- [18] 徐时仪. 玄应《众经音义》口语词考[J]. 南开语言学报,2005(1):97-105.
- [19] 梁晓虹. 汉语成语与佛教文化[J]. 语言文字应用, 1993(1):91-98.
- [20] 颜洽茂. 试论佛经语词的“灌注得义”[C]//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辑. 成都:巴蜀书社,1998:160-165.
- [21] 王云路. 试说翻译佛经新词新义的产生理据[J]. 语言研究,2006(2):91-97.
- [21] 俞理明. 从佛经材料看中古汉语人已代词的发展[J]. 四川大学大学学报,1989(4):61-68.
- [23] 解植永. 佛教文献中的架设连词“若也”[J]. 宗教学研究,2006(3):201-204.
- [24] 徐朝红. 中古汉译佛经连词研究——以本缘部连词为例[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91.
- [25] 曹广顺. 《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J]. 中国语文,1986(3):15-26.
- [26] 武振玉. 魏晋六朝汉译佛经中的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初论[J]. 吉林大学学报,2002(4):123-128.
- [27] 唐钰明. 利用佛经材料考察汉语词汇语法史札记[J]. 中山大学学报,1993(4):91-95.
- [28] 朱庆之. 汉译佛典中的“所V”式被动句及其来源[J]. 古汉语研究,1995(1):29-31.
- [29] 吴金华. “R为A见”式述例[C]//古文献研究丛稿.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19-32.
- [30] 高列过. 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研究概述[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6):76-82.
- [31] 董琨. 汉魏六朝佛经所见若干新兴语法成分[C]//中古汉语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24.

(责任编辑 王莉)